

回顧一個學制改革失敗的個案：1988年香港民間所提出的中學及專上學制的藍圖

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education reform: critical review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blueprint in 1988

葉國洪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

摘要

1988年民間教育團體提出之教育制度全面改革藍圖，主張大學全面四年制，一方面反對政府強行將中大四年制改為三年制的措施，另一方面提出解難建議的學制改革藍圖。當時政府拒納意見，部份民間教育團體提出改革藍圖好夢成空。本文擬就民間首次提出全面教育改革的意圖作一歷史回顧，為當今教育改革注入源頭活水。

關鍵詞

學制改革、專上學制改革

Abstract

Th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has published recently a report on the new academic structure for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The proposed "3+3+4" reform will provide three years of ju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three years of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four year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Many educators supported this proposal.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current proposed reform is actually similar to a blueprint of the academic structure reform put forth by 21 education concern groups in 1988. The blueprint was proposed as a response to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Number Three published in 1988. And this blueprint was not accept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is paper reports and comments on these proposals and blueprints with a view to generating constructive insights for building an ideal educ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Keywords

reform on academic structure, review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一) 理想教育的夢想

歷史的發展和文化的創造，往往是由人類「追求完美」（止於至善）的特有心態所推動。理想的社會和理想的教育制度，曾由不少高瞻遠矚的哲學家和教育家提出過。在他們希冀渴求的理想社會中，人類可以生活在和平、自由、平等、富足、正義、智慧和優美的環境之中，而教育則是實現理想社會和塑造人性的重要手段。¹

盧梭（J.Rousseau）的《愛彌兒》（Emile）引發的教育的重大革新，杜威（John Dewey）稱之為教育史上的哥白尼運動，² 漸成「兒童本位教育」的潮流。而柏拉圖（Plato）《理想國》（The Republic）中的教育構思便成為日後國家主義（甚至是共產主義）教育思潮的濫觴。

前者強調教育應與生活合一，教育的目的在造就良好公民，而教育的過程在使兒童於大自然環境中遊戲、運動、娛樂，避免與鄙俗的文化接觸。讓小孩有一切可能的自由學習，始能啟發健全人格，並有利於新社會秩序的建立。

而柏拉圖的《理想國》（The Republic）主張以理性來統御意志和感情的一種哲人政治，強調社會和諧的基礎是在於「社會正義」能否深入人心，因此教育即是這些理想能否實現的重要工具。

此外，Robert T. Fisher 在其 Classical Utopian Theories of Education 中指出理想的教育形態有四個特點：³

- (1) 「自由」是理想社會的基礎
- (2) 國家建立在人民的「信仰」之上
- (3) 教育是此社會上的基本「制度」
- (4) 正義是國家的基本功能。

然而，K. Mannheim 曾指出：烏托邦（Utopia）思想，會使人心理上產生一種「迷思」（Myth），所以有時會使受到壓迫和痛苦的人，在面臨社會解體的時候，很容易在領導人物的登高一呼之後共同為「迷思」

的理想社會而奉獻，並參與實際行動（例如馬克思，希特勒的群眾運動），在宗教上，耶穌基督也以「天國」為號召，使得信仰具有形成規範世俗道德的作用。⁴

八十年代末期，香港也曾出現過一套教育制度（學制）的理想，亦曾引起過風起雲湧的學潮。

在本港究竟有什麼教育理想的藍圖？在1988-89年間確曾醞釀過一個理想的專上教育藍圖，只可惜曇花一現。

香港可算是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樂土，而香港中文大學更具有為中國文化發揚光大的文化理想（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先生強調承傳中國文化的「新亞精神」⁵）。可是，自從教育統籌委員會在1988年6月中發表第三號報告書，建議所有學位課程一律三年制，學術自由便在一定程度上受制肘了。報告書發表後，教育界嘩然，香港中文大學師生、校友更群起反對。中大的教育理想受到莫大的壓抑和窒礙。如不作出適當反應，則理想將俯伏於「現實」腳下，永無翻身的機會。

(二) 港英政府強行「四改三」的反響

除了提出反對外，香港中文大學師生透過與其他文教團體的合作組成聯席會議，提出他們心目中理想學制的藍圖，可算是創舉（一反香港人當順民俯聽的傳統歷史習慣）。

本港理想專上教育的藍圖，大約在1988年9月間提出，由廿一個文教學生團體成立的「關注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聯席會議」，並發表「關於《第三號報告書》中學及專上學制的建議書⁶」，提出了一個未來中學及專上學制的藍圖，為本港民間提出理想學制破天荒的第一次嘗試。

「聯席會議」的建議書⁷以徵求意見稿的形式發表，並歡迎教育界及社會各界人士提出批評和建議。該會針對當時專上和預科學制的混亂情況，提出一個過渡期及最終學制的建議。

聯席會議對改革學制提出的建議，並沒有忽略循

序漸進的步驟，主張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實行過渡方案，第二個階段是最終方案。

第一個階段的特點：

- (a) 當時存在的中學學制不變，即五二制（英中）和五一制（中中）並存。
- (b) 設立一專上院校聯合招生制度，正如中大和港大早已提出的具體方法。
- (c) 統一收生點在中六。
- (d) 專上學院收生要根據中五會考成績錄取學生。

在過渡期內，還要為實現第二階段的最終方案造就下列的條件：

- (a) 設計三年初中，三年高中課程，並出版課本。
- (b) 為推行中學多元化，作為學校設備及師資的準備。
- (c) 設立一個被政府和海外承認的高中會考。

第二階段的最終方案：

- (a) 六年中學和四年大學學制。
- (b) 學生完成九年免費教育後，（三年初中三年高中），根據學能和性向，透過輔導，分流到文法中學內不同流向班級（如文、理、工、商）和其他不同類型的學校（職業先修、工業學院）去。
- (c) 分流的技術問題，尚待從詳計議，但原則上分流到非文法中學的學生，應與文法學生一樣，在三年高中後，經過一個政府和海外承認的高中會考，根據其成績而決定升學或接受職業訓練就業。
- (d) 各專上學院根據高中會考成績聯合招生。
- (e) 所有一般學士學位課程為四年。
- (f) 各專科和專上學院，則按本身實際情況，決定其修業期限。
- (g) 1996，1997，是理想新學制實施時期。

聯席會議一反往日習慣，不只提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修補意見，更進一步，在全面檢討學制的基礎上，針對專上教育種種積習難返的問題，提出全面的改革路向。

短期而言：統一收生點，減輕預科考試壓力。

長遠而言：為適應學能和性向不同的學生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

其實，第三號報告書亦贊成上述兩項：

- (1) 統一收生點；
- (2) 預科（中六）學制的統一。

問題在於報告書強調以英文中學制度為基礎的「中七」為收生點，中文中學，甚至中文大學的原有體制漸漸被淘汰，即「中六（中文大學）一年」及「大學四年」制被揚棄。

如果能將爭論點折衷，兩者（聯席會議及教統會）均贊成統一收生，免滋混亂。

可惜，聯席會議的理想藍圖，雖經多方面諮詢和修訂，但終被視為所謂「與中大的反對派聲音」而被漠視（作者親聞）。

1988年11月，教統會在各方意見紛紜情況下，把報告書的大學學制建議部份原封不動呈交當局，引致中大師生於12月2日罷課半天，逾四千人參與。及後在12月8日該校畢業禮上高錕校長提出準備試行四年前已籌備的「靈活學分制」，教統科官員對該制一再公開表示歡迎，認為有助解決學制之爭。然而，行政局於1989年1月接納第三號報告書，決定中七為統一收生點，只是容許中大九年過渡期算是讓步（原只予六年過渡期），中大師生雖強烈反對，但政府亦不為所動。

而聯席會議所提理想藍圖，正式宣佈夭折。

（三）

追源中大創建的伊始，實始於1949年國民黨政權退出大陸後，大量中國學人湧到香港，以中文為主的專上學生數以千計，中文中學的建立如雨後春筍，1957年中學畢業生達七千人，而香港大學每年只收二百人，於是香港幾家中文專上學院的院長，如崇基學院凌道揚，新亞的錢穆及聯合的蔣法賢各投函南華早報，呼籲設立「以中文為教學媒介的大學」。至1959年6月，柏立基任總督，自英邀富爾敦來港策劃中文大學之建立。⁸由於中文中學升讀大學，故中

大年制比港大年長一年。（即中大四年、港大三年）及至七十年代中期，香港中文中學數目減少，原因是社會上普遍存有重英輕中的態度，加上1974年中學會考中英會考合卷後有大量英中開辦，中文中學減少，中大收生漸感困難。

1983年中大實行暫取生制度，目標是把英中會考成績優良的學生優先取錄，待中六畢業後，便升入中六，希望把學生質量提高。這一措施實行，造成兩間大學之間出現收生的競爭。

可是中六學生透過暫取生制度進入中大，卻導致中七學額出現空缺，中七預科就讀情況出現混亂，使許多英中校長產生怨言。⁹

當時港大亦不甘後人，於1986年提出要回復1954年以前四年學制，名為增加一年基礎年，藉此提高英文水平，實則是要與中大收生看齊，保持收生質量。¹⁰

建議一出，令港府大感頭痛，因兩所大學的收生政策，只會令預科教育更加混亂，於1983-1988年間，香港多個中學評議會紛紛對中大暫取生制度提出批評。

這場爭論到1988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第三號報告書後，便進入白熱化。

（四）民間教育烏托邦的冒升與殞落

查中國比較具系統性的新型學制，是清末光緒29年（1903），由張之洞，榮慶及張百熙擬定，清廷核准的「奏定學堂章程」其中的規定的學校系統，即「癸卯學制」，這個學堂章程性質接近今日的制訂全盤學制安排報告書，為中國教育現代化奠定良好基石。¹¹

辛亥革命後，學制不斷更迭，均由官方決定，及至五四後，當時民間教育團體「全國教育聯合會」主持之討論會，協商制度「壬戌學制」，於1922年教育部通過，學制為三三四制，至今無大變更，大陸及台灣大致如是。

可見民間教育團體議定教育制度的理想模式，並非沒有先例。

然而，在本港是次聯席會議的組織，其致命傷乃代表性不夠全面，理工，浸會方面代表缺席，而中學方面更缺乏英中方面的代表，這方面的缺憾，一如教統會成員代表性不足一樣，埋下英中校長聯名支持中七為收生點，反對更改中學學制的伏線。¹²

若要評析這個理想藍圖落空的原因，可以從三方面去分析：

（1）「天時」方面

以中大創校之始，為遷就被置於港大三年制學制外的中文中學畢業生，設定四年制學士課程，以此讓以中文為應用語言的學生多修一年。

及後中文中學式微，中學畢業生減少，港府約於1978年前向當時中大校長馬臨提出四年制改為三年的建議。¹³當時中英就香港主權問題開始進行談判，故此事暫時擱置，及至港大提出「三改四」、增加一年基礎年以讓學生進修英語，以便與中大聯合招收中六學生。¹⁴

此計劃提出後，政府透過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要求中七為大學入學點，不但港大「三改四」不成，中大亦須四改三，¹⁵以便與英國系統的（英國模式）專上學制及專業資格掛勾，¹⁶主要是保持與英國本土學制的連繫。

第三號報告書3·18節明言：「政治因素……部份評論者顯然相信，香港應該仿效某些國家的做法，即全部院校均採用一個四年學制學士學位的體制。他們當中亦有主張放棄其眼中『英國模式』。本委員會聲明，不同意上述論點。¹⁷」

五千位中大、樹仁、港大學生於1989年2月2日在中區和平集會遊行抗議行政局通過三號報告書。另一方面，中大教務長楊汝萬聯合基本法諮委以個人名義聯函中英聯合小組首席代表柯在鏞，指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所提有關高等教育學制的改革建議，有違中英聯合聲明。¹⁸

中方婉轉答覆，謂學制問題，宜由港內解決。¹⁹稍後，新華社香港分社文教部部長翁心橋公開表示教統會報告書意見分歧多，港府不宜倉卒作出決定，²⁰中大教務會公開表示決定不接受行政局的兩次決定（即中七收生及大專院校同一科的修業年期原則上相

同²¹)。其後，中大宣佈實行「彈性學分制」以沖淡第三號報告書所引起情緒上的不快。²²

(2) 在「人和」方面

港大頗有可能為打破中大「暫取生制」吸取優良學生局面而贊同「三改四」，以謀求聯合收生，平分精英新生，例如黃麗松校長主張在社會需要下，政府港大可「三改四」，而新一任校長王賡武亦贊同改革。²³

初時不少中學校長表示不反對港大「三改四」，但自從教統會發表三號報告書後，政府便安撫中學，謂「四改三」是在中學學制不變的前提條件下進行，誘使中學校長失去反對改制的強烈動機。於是在中學學制不變的前提下，教統會以中七為大學入學點，合併大學入學試，使中大有點措手不及，難於力挽狂瀾。

令中大師生更難過的是教統會主席利國偉又是中大校董會主席，亦是行政局議員，三重身份，而報告書建議，明顯對中大不利，故中大師生群情洶湧，激烈者一度要求利氏辭去中大校董會主席一職(作者親聞)。

另一方面中大師生一致對外強烈抗議，群眾運動此起彼伏，學生大罷課前夕，政府亦不敢怠慢屢易草案，終允中大以九年為期，漸進式以中七為入學點，中大亦拋出四年前倡議的「彈性學分制」以作下臺階，²⁴表面上互有讓步。

當時聯席會議成立之初，教協與中大教協成主流，在人物方面，有學者指出港大中大教育學院方面教育專業學者相對地較少發言，對學制改革藍圖亦較少直接參與草擬，反映此事學術性少於行政性，藍圖的構思，似乎是策略性多於理論性。

雖然，「三三四制」有利於銜接中、美、日等學制，而「五二三」制，卻是「英國連繫」(British Linkage)重要關鍵。²⁵

故此，港府教署及教統會成員，多傾向于英式，故不斷遊說英文中學校長，不少校長本不喜中六「暫取生」制擾亂英中預科行政，故公然提出支持第三號報告書高中政策部份，港大、中大頓感意外，倍感棘手。此外觀點和理念不同前題下，即使港大方面，港大教育學院部份講師，亦非一致支持「三改四」。

於是，在眾說紛紜聲中，行政局議員亦有一半以上支持「五二三」制。²⁶

此外，聯席會議更缺乏理工等方面的支持，理工校方為謀與兩大競爭及維持專業資格試體系不變，公開支持「五一三」制。

(五)

綜合而言，香港民間團體，由中大為主力，港大及教協為中流砥柱，結合部份關注教育的社團，組成聯席會議，他們經過反覆研究，提出改革學制的理想藍圖，呼籲全港關注高等教育人士參與及提供意見，在本港教育史上實行前所未有的創舉，是教育民主化的先聲，所提「六四」制亦合世界潮流，合乎繁榮社會的需要。

只可惜「天時」、「人和」兩方面的不利，香港政府在回歸前仍堅持跟英國教育系統保持聯繫，用行政手段(中大若擴大收生名額，須以中七為入學點)，否定聯席會議所提理想的專上學制藍圖，而中大則以「彈性學分制」緩和矛盾，為免失去收生學額，為保政府資助以維持優質教師隊伍，只得漸漸淡化四年制。

若政治氣候沒有大改變，社會經濟亦能保持繁榮，能用有限資源增加大學生的入學數量，亦無可厚非。²⁷中大港大可以先穩步保持大學良好質素的四年制，然後再向下伸延為三三制的中學教學理想。然而政府控制資助，另一方面數十位中學校長聯名反對，「理想的專上學制藍圖」則只可望洋興嘆，實現似遙遙無期了。

可幸，Robert T. Fisher 所說自由是理想社會的基礎，所言甚是，所幸本港仍允許自由討論學制改革，可以各抒己見，雖學潮迭起，最終仍能和平解決，各方面亦互有讓步，各方面仍留情面，這正是「香港教育界有更美好的明天」的可靠保證。

說到底，英國政治勢力退卻，但仍希望英國式教育系統培養出一些受英國文化影響的港人，將來有利於維繫英國的政治，經濟利益。

但亦不要忘記，英式教育並非一無是處，仍是

民主自由教育，有抗衡專制主義影響，有利於高度自治。²⁸

港府終於運用財政壓力(透過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撥款²⁹)迫使中大就範，但是目的是將有限資源，首先放在專上學額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教育機會均等理論的初步實現，促進社會流動。³⁰

「四改三」事件中，中大、港大都表示不同程度上反對，群情洶湧，事後港府將教統會成員改組，加入教育界人士作委員，另外教育署署長李越挺公開發表論文，表示教育政策應與教育學術研究互相配合，

³¹ 總算有從善如流的傾向。

最後，由於教育等新問題，錯綜複雜，經緯萬端，故任何理想教育藍圖須配合客觀環境，調整各階層利益，不宜單憑行政手段去獨斷獨行，應有效利用各類專家學者及學術研究成果，³² 在教育決策前，加強多方面協調配合的諮詢系統，³³ 擴大各階層教育社團的「民主參與」(democratic participation)，³⁴ 以理性及良知為主導，並公開諮詢以達成共識，公平處事，用「和諧」協調，代替互相抗拒壓制，否則教育改革便變成閉門造車，即使是再好的理想藍圖，只成能為空中樓閣了！

註釋

- 1 陳伯璋(1987)。〈古典烏托邦思想及其對教育的啟示〉。《教育思想與教育研究》，頁185-204。臺北。
- 2 Dewey, J. (1956).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nd The Child and Curriculum*.
- 3 Fisher, R.T. (1963). *Classical Utopian Theories of Education*. Connecticut: College University Press.
- 4 Mannheim, K. (1972). *Ideology and Utopia*.
- 5 王俞(1982)。〈中文大學的本質〉，頁190-203，載於學聯及中大學生會編《香港教育透視》。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 6 金耀基(1998)。〈大學的世界精神〉，《大學之理念》。香港：牛津出版社。
- 7 星島日報(1988年9月1日)。報導指該組成員部份重覆，如中文學生會，與其他成員院校學生會身份上重覆，但組織上獨立存在。
- 8 該聯席會議成員有：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教師會，香港中文大學教師協會，香港大學教育改革關注小組，香港樹仁學院，中大校友會聯會，香港中文大學聯會，津貼小學校長會，官立非學位教師職工會，教育行動組，大學畢業教師公會，中大教育學院校友會，工業學院教師會，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聯合書院學生會，崇基書院學生會，基督徒學生運動，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
- 9 王俞(1982)。〈中文大學的本質〉，頁195-197，載於學聯及中大學生會編《香港教育透視》。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 10 賀國強(1987)。《當前香港教育問題》，頁108-114。文中指出覺得中大暫取生制「霸道」，不理中學方面反應。香港。
- 11 明報(1988年6月27日)。報導港大歷史系講師陸人龍指出當初港大內部建議三改四時，中大並未實行暫取生制度。只聆聽學生質素存在問題，認為港大三改四與中文暫取生制度是無關的。
- 12 葉國洪(1984)。〈晚清學部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4教育碩士論文(未刊本)中大圖書藏。
- 13 明報(1988年10月25日)。報導英中校長反對「四改三」聯合聲明。
- 14 明報(1988年10月13及14日)。嚴元章，〈夥可奈何花落去，百年世事幾番新——教統會三號報告書讀後感〉。
- 15 大公報(1986年11月20日)。報導李紹明(港大教育學院顧問)「港大改制值得欣賞」，文中謂港大由三改四後，這制度的利益十分明顯……令本港兩所大學的學制和年期趨向統一，對學生有極大好處，並能減低目前兩大學制混亂對學生構成的無所適從。

- 15 中大教育學院講師鄭肇楨認為教統會此舉：
① 侵犯大學自主權
② 大公報（1988年6月18日）。報導不尊重中大建校理想，及實現這理想所需有的四年制道德教育的學制與干預大學的收生辦法。
- 16 明報（1988年9月3日）。報導中大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公開批評教統報告，旨在維持「英國模式」，兩年制「中六」有利大量港生升讀英國大學。
- 17 《第三號報告書》，頁15。
- 18 星島日報（1989年1月6日）。
- 19 明報（1989年1月8日）。
- 20 快報（1989年1月16日）。
- 21 香港經濟日報（1989年2月1日）。
- 22 大公報（1989年11月13日）。報導〈支援施政報告有關擴展高等教育的建議〉，間接支持第三號報告書，冀求中方支持「六四」學制，希望更成泡影。
中大學生報（1989年11月30日）。見水光，〈從中英關係的大氣候看〔港督〕施政報告〉。
中大學生報（1989年11月30日）。報導〈又關於學分制〉，《學分制檢討報告書修定內容》。
- 23 《港大前瞻—香港教育未來》（1986）。黃麗松（前港大校長）談「三改四」年制。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編，頁200-202。信報（1986年6月24日）。黃麗松，〈談港大學制改革〉。
- 24 當年，筆者身為中大教育學院校友會會長，於1989年4、5月間走訪教統會主席利國偉、中大校長高錕、港大校長王賡武、中大副校長金耀基（金氏曾在晚宴中向中大校友會各成員會代表解釋中大採學分制原因）聆聽寶貴意見。
- 25 有學者指出由於近年英國經濟成長稍緩，失業問題頗嚴重，英人升讀專上學院者不多，形成高等院校面臨收縮危機，故有「輸出教育」以爭取外匯，維持院校生存的趨勢，而吸引富裕國家的學生赴英留學，先決條件是學制上的銜接，而「中七」為大學入學點對英學院最有利。
- 26 香港經濟日報（1988年10月27日）。報導「立法局六小時半會議辯論三號報告書」(1)大部份議員贊成中七為大學的收生點(2)大學學制基本訂為三年。
- 27 據中大教育學院校友會幹事（1988-1989）訪問前教統會主席利國偉爵士口述紀錄，關鍵問題在於中大、港大行四年制，花費自比三年制大，而科技大學，公開學院亦跟隨四年制，理工、浸會、嶺南亦跟隨，教育開支必然大增，長遠而言，不利於擴大專上學額數量。
明報（1988年6月17日）。報導利爵士有類似發言。
- 28 香港時報（1989年10月25日）。黃康顯（港大校外課程部主任），「再評港督施政報告」。
- 29 明報（1986年5月13、14、15日）。報導關於大學及理工教育委員會的運作情況，可參陸鴻基「維護學術自由的關鍵制度—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
- 30 林清江（1987）。《文化發展與教育革新》。教育數量的擴充，有利教育機會均等，政府資助的大學，學費及津貼較多，低下層而能考入大學的學生，其經濟壓力可減少，頁127-149。臺北。
- 31 教育研究（1989年冬）。《教育研究學報》。卷四。
- 32 楊國賜（1980）。《系統分析在教育革新上的應用》，頁165-171。臺北。
- 33 黃昆輝（1975）。《教育計劃的方法》，頁15-16。臺北。
- 34 Hartley, H.J. (1968). *Educational Planning Programming Budgeting*, pp 11-12. New Jersey.
楊國賜（1987）。《現代化與教育革新》，頁199-275。臺北。